

救斯文之薄：論北宋初年書院的教育目的

羅智韋¹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宋初年書院的教育目的。過去研究認為南宋書院教育與道德性的教學理想有關。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為：書院教育是否純然與道德相關？從北宋初年書院的發展或可看出端倪，本研究發現：北宋初年，官學教育未能即時因應教育之需求，書院成為補充官學的一種方式。又因朝廷崇尚文人之治，書院的發展與科舉之間的關連密切。從應天府書院的為學目的、慶曆新政推行地方官學，乃至宋初三先生之講學，書院講學是為了求理想的政治格局，一如范仲淹之語「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是以，「救斯文之薄」是北宋初年的書院教育目的。

關鍵詞：書院、官學、斯文、教育目的

¹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通訊作者：羅智韋，E-mail: blueerik3@yahoo.com.tw
收稿日期：2019/04/29；接受刊登日期：2019/12/06
DOI:10.6618/HSSRP.202006_14(2).4

壹、前言

依今人李弘祺之研究，宋代書院之興，乃從朱熹以降的「私學理想」開始，這是強調書院的特質在於對知識的追求與高度的道德感鼓勵（李弘祺，2012: 89）。但若細究宋代書院的發展，則不能只單就「私學理想」批判官學流弊單一特性而論（梁庚堯，2003: 49-50）。¹影響宋代書院的設立、數量、發展乃至所謂的「私學理想」，有其複雜的因素影響。根據過去的研究，宋代地方官學興起²之前，書院的定位有如下之說法：鄧洪波認為書院的角色是政府短期無力恢復官學系統的一種權變措施（鄧洪波，2006: 77），而李兵更直指書院為「官學的替代機構」（李兵，2005: 40）。但是，宋初朝廷是否有意將書院視作「替代官學」的角色，則需更多史料佐證。事實上，北宋初期文教發展，人才選拔重於教育機構設置，科舉取士名額與投身科舉士人的比例差距亦高（周愚文，2012: 105-134），保守論之，書院此期可能僅是做為士人投身科舉的學習機構之一。由此而論，宋初的書院設置與從朱熹以降之「私學理想」特質相距甚遠。

有關宋代書院的教育目的，賈志揚（John W. Chaffee）、陳雯怡與梁庚堯的著作各有論述：賈志揚在書院教育目的的論述有幾個重點，一、北宋時期的書院少數有官學作用，大多數是非正式的小型學校或學者的書齋。二、南宋時期的書院在很大程度上拒絕準備科舉考試，提倡新儒學的自我修養。不過，賈志揚也承認，書院中對於科舉生活的反對實際上有限，與書院相關的人很少完全拋棄官場，士人可能既在書院讀書，又去參加科舉考試。而官方對於書院的影響也是有的，例如書院接受賜匾、皇帝命令創辦等。但即使是如此，他仍然肯認南宋書院的廣佈，有助加強士人的道德權威與意志自由（賈志揚，1995: 135，140-142）。從書院與科舉間的非抗拒性出發，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一書是很好的例子。其基本論點是：雖然書院蘊含道之尊嚴的「私學理想」，但並非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書院的真實面貌必須回到科舉與教育的關係來理解，她的研究發現，宋時期的官學到書院，「選」到「養」，都跟科舉有關。其論述的角度乃自發展脈絡觀察制度和理念的互動，認為教育與社會文化有聯繫關連，將教育史還原作為歷史的一部份，書院的發展則置於整個宋代社會的歷史特性與兩宋教育發展的脈絡之中（陳雯怡，2004: 392）。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一文，更是提出南宋書院的私學理想未必與科舉制度對立，即使是理學家講學的書院也不必然排斥舉業的教學（梁庚堯，2003: 50）。對於書院與科舉間的關

¹ 梁庚堯以為宋元書院的發展，其私學理想未必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梁庚堯，2003: 49-50）。梁庚堯此文列舉史料主在指陳書院與士人應舉學習的需求，只是，兩宋書院發展是否全然與舉業相關，亦可再商榷。

² 根據李兵的整理，趙鐵寒在〈宋代的州學〉以為州學之興應該始於乾興元年；另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則以為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的36-43年就開始（李兵，2005: 31）。周愚文則依《資治通鑑長編》考析，認為政府主動興學要到仁宗朝（周愚文，1996: 6）。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因允兗州田十頃，以為學糧，可視為宋代州學之始，但這已是宋朝開國六十二年之後了（李燾，1995: 2303）。

係，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提出兩宋書院發展面向的複雜度：自北宋初朝廷無力辦學，書院以「替代官學」之貌出現，其中乃是順應士人求學，書院因重新修復而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另有豐富藏書與名師巨儒之任教者，並提供跨地求學機會，北宋中晚期後因三次興學之故，官學興起，書院漸次沒落。至南宋，新儒學興，書院發展雖批評科舉取士但並不等於反對科舉制度，形成德業與舉業並重之況（李兵，2005: 25-105）。

其實，宋代開朝之初，因「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呂祖謙，2006: 112），由於士人社會的自發、科舉應試的需求，書院承接教化功能或科舉需求，此乃朝廷財力未逮之權變舉措。一如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言：「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朱熹，2002: 3782-3784）。

自唐代起，「書院」之名出現於中國歷史，依陳東原之考，唐代如「麗正」、「集賢」等書院主要作為藏書、校書之用，與後世之圖書館相類，而不能稱之為學校（陳東原，1966: 274-275）。再依嚴耕望之說，其論唐人習業山林之況，其中論及宋代書院制度是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其論為：宋書院之最早者如「白鹿」、「石鼓」、「太室」（後更名為嵩陽）、睢陽（即應天書院）、嶽麓，其中睢陽書院始於五代晉末戚同文講學、其餘均為唐代士人習業最甚之山林（嚴耕望，2009: 928）。而到了宋代，經歷趙宋立國之初文教疲弊，成為暫時性的教育場所，各地興起主因雖不盡相同，多數可能接受朝廷資助³，此時之書院設置具有官方色彩。然而，北宋初期文教發展，人才選拔重於教育，科舉取士名額與投身舉途士人比例差距甚高，是否因為這樣的情況使士人投入書院學習，有待深入討論。然不論如何，自北宋初期觀之，書院由於官方的投入、依附於科舉制度與暫代官學性角色下，其理想性格猶未透顯。

宋初年開啟的書院教育傳統在功能上有其獨特性，並不必然與純然道德性之私學理想相關，而與官學教育發展互有關聯，並具有經世致用之「救斯文之薄」的教育目的。本文所討論之北宋初年書院的教育目的，時間以宋仁宗時期慶曆革新前後及至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與石介）的講學歷程為主，另旁及所涉之書院教育內容。

貳、書院與官學合流之況：以應天府書院為例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時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與同母異父的朱家兄弟因為用錢一事產生爭執，朱家兄弟一句「吾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使范仲淹決意門戶自立，開始了「南都學舍」五年的苦讀生涯（樓鑰，2002: 865-866）。

³ 北宋初期，政府給予書院獎贈，以賜額、贈書與贈九經等方式扶持。見：宋·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說法：「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李燾，1995: 402）。

其實，「南都學舍」即五代之「睢陽學舍」，而此時的「睢陽學舍」已是官設的「應天府書院」（梁庚堯，2015: 251）。在五代十國時期的「睢陽學舍」，歷經楊慤、戚同文之經營，「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脫脫等，1977: 13417-13418），後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皇帝詔新建書院，並賜院額（王應麟，2002: 3174）。

接下來，我們以應天府書院為例，試圖梳理北宋初年書院發展的脈絡。根據《宋會要輯稿》錄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二十四日詔，明白論及朝廷賜額予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新建書院，以府民曹誠為本府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故工部侍郎許驥、侍御史宗度、度支員外郎郭承範、董循、右諫議大夫陳象輿、屯田郎中王礪、太常博士漆（案：應作「滕」）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同文有子二人，維為職方員外郎，綸為龍圖（案：應作「圖」）閣待制。至是，誠出家財，即國（案：應作「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令同文孫奉禮郎爵（案：應作「舜」）賓主之，召明經藝者講習。本府以聞，故有是命。并賜院額，仍令本府職事官提舉（徐松，2016: 2188）。

又，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亦有類似記錄：

三年二月，賜英州文宣王廟板本《九經》。《宋大事記講義》云：祥符二年二月，許曲阜先聖廟文學賜應天府書院額，州郡置學始此（徐松，2016: 2188）。

今人李弘祺引樓鑰所著〈范文正公年譜〉中的序言提到范仲淹「居南都郡庠五年」（李弘祺，1990: 1407），因未提及「書院」，其論應天府書院具有「府學」色彩。我們再與上《宋會要輯稿》的說法合觀，應天府書院雖然名為「書院」，卻因接受朝廷賜額之故，遂具有官方色彩，類似的說法也在樓鑰其後對於范仲淹的記錄：宋仁宗天聖五年，因晏殊故而「請公掌府學」（樓鑰，2002: 870）。應天府書院的發展，確實顯示其具有類似官學的定位，例如《續資治通鑑長編》所錄：

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乃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李燾，1995: 1597）。

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李燾，1995: 2761）。

由上可知，應天府書院受官方賜額，爾後更替為府學，接受田產。應天府書院作為宋初書院的一個個案，其從地方講學之所一躍成為具有官方色彩的教學機構，顯然就不是居於官方之對立面。過去已有研究者以為，宋代地方官學興起之

前，⁴書院的角色定位在政府短期無力恢復官學系統的一種權變措施（鄧洪波，2006: 77），並直指書院為「官學的替代機構」（李兵，2005: 40）。可以說，書院此期其實僅是擔負士人投身科舉的學習機構之一。依前所述，由於書院官方色彩濃厚，下文便論及宋初書院發展與科舉之間的關係。

參、宋初書院發展與科舉取士之關連

一、北宋初年科舉取士重於學校教育之況

北宋建國之初，鼓勵士人讀書以矯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之弊，具體展現在宋太祖對於科舉的重視，他曾在建隆三年詔令：

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於公朝，寧謝恩於私室，將懲薄俗（賈志揚，1995: 74）。

另外，太祖對於年號一事，更心生感嘆「宰相須用讀書人」：

上初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李燾，1995: 171）。

是以，科舉取士成為宋初實行文治，拔擢士人的穩定策略。其實，有研究指出宋朝對於科舉取士的重視，例如：供給貢士赴考旅費（梁庚堯，2015: 4）、增開科舉錄取名額⁵與皇帝賜宴（梁庚堯，2015: 4）。以上諸多事件表示宋初文教乃採士人拔擢為先，然事實上正式學校的設置卻付之闕如。

二、鄉黨之學先於州縣之學

自宋開國後，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二月才有賜白鹿洞書院九經之舉，宋真宗以前，政府並沒有注重地方教育（周愚文，1985: 12）。例如《文獻通考》便提及鄉黨之學先於州縣之學：

⁴ 根據李兵的整理，趙鐵寒在〈宋代的州學〉以為州學之興應該始於乾興元年；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則以為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的36-43年就開始（李兵，2005: 31）。周愚文則依《資治通鑑長編》考析，認為政府主動興學要到仁宗朝（周愚文，1996: 6）。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因允兗州田十頃，以為學糧，可視為宋代州學之始，但這已是宋朝開國六十二年之後了（李燾，1995: 2303）。

⁵ 李兵（2005: 26）指出，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年）至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共開科26次，錄取進士5337人，諸科進士11877人，特奏名5807人。

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馬端臨，1986: 431）。

這裡表示北宋之初，鄉黨所立之書院乃由地方賢士所建，非由政府發起。而《玉海》所謂天下四書院之稱：白鹿洞、嶽麓、應天府和嵩陽（陳谷嘉，鄧洪波，1998: 41-45），僅由政府給予獎贈、賜額、贈書與贈九經等方式⁶扶持。

三、官方涉入書院興廢

另一方面，北宋官方有收書院美田，聽其荒廢之情，更顯示官方涉入書院的設立：

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折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李燾，1995: 476）。

今人劉子健（1986: 191）認為以上書院，官方任其停廢，可能怕有潛伏前朝舊臣，窩藏不法文氓之況，並舉出蒯鼇、廬絳等人「居鄉博飲無行，不為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入廬山白鹿洞書院。」

四、書院與州縣學的發展

此外，另有說法提到北宋時期書院後與州縣學其實是同時興起的，例如王夫之《宋論》言宋真宗才是宋朝書院之始：「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王夫之，2017: 211）。此一方面提出北宋書院與後來的州縣之學並無明顯差異；另一方面也間接認為宋真宗以前的書院發展並不能算是成氣候。

是以，從以上諸事件說明：北宋初期書院的發展有幾種情形：一、地方賢士鼓勵；二、政府獎贈扶持；三、若干令政府有疑慮之書院任其停廢；四、書院與地方官學同時發展，甚或成為官學。由這些情形可窺見：書院在此時期僅能成為官學的附庸。⁷

至於官方政策的影響與北宋初期書院的發展亦有相關，我們就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的過程來看官學與書院的發展。

⁶ 宋·李燾（1995: 402）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 指明：「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⁷ 中國大陸學者屢以「替代官學」之稱來界定這個時期的書院，類似的說法見於：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與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但宋初政府是否有暇兼顧地方官學發展而將書院視作「替代官學」的角色亦需更多史料佐證，是以，本論文不採「替代官學」之稱。

肆、范仲淹慶曆新政官學教育與書院的發展

以范仲淹、韓琦為首的「慶曆革新」肇始於宋仁宗年間，對於官學起興有莫大的影響，下文談「慶曆革新」中對於教育政策的發展脈絡及其對於書院發展之關連。

一、〈奏上時務書〉救斯文之薄

在「慶曆革新」之前，范仲淹於宋仁宗天聖年間對於政治改革已有初步的看法，〈奏上時務書〉於天聖三年（1025）提出，「救斯文之薄」則為該文之核心，茲錄其文如下：

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范仲淹，2002: 200）。

易言之，范仲淹尚以古為法，而惡真宗以來之雕琢文風（包弼德，2015: 211）。從宋朝的經學歷史脈絡來看，南宋吳曾嘗言「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亦可呼應范仲淹此時的疾呼（方笑一，2017: 32）。當然，救斯文之薄或許乃是為求《論語》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中對於當時政治文化的一項終極肯求（朱熹，2018: 89）。這和「奏上時務書」文中提到之「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相契，范仲淹所欲救之「斯文」所代表之政治秩序/宗法禮制涵涉甚廣，其中，除論「救斯文之薄」之外，所談範疇另包含：「善安國者」應有「有教化經略之備焉」；仿「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庇蔭所招致來的「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應以德御天下；「與忠臣治天下」；「深防逸豫」、「必循典禮」的選任賢能論；從風俗、聖賢、文武諸項之政治格局而論「用人之議」宜採「遠大之謀」；勉人君勿「獨斷」而失慮、「偏聽」而衆心離。

就〈奏上時務書〉之文脈而言，范仲淹先談對政治秩序（斯文）之希求，接下來所論關乎教育、涵養人才者，大抵以廣納眾議，以求政治清明、革新之務。從〈奏上時務書〉的內容看來，此時的范仲淹以「興復古道、維持政治秩序」為主要訴求，所論之觀點還未能直指具體政治舉措，要言之，范仲淹要談的是他理想的政治格局。

二、〈上執政書〉、〈上時相議制舉書〉崇「古者庠序列于郡國」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呈〈上執政書〉（范仲淹，2002: 210-229），其中提出當時國家政局所面臨的困境：

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

依上所言，范仲淹指出幾個問題：一、國家無憂，致使忠言難盡；二、天下久平，致使禍患易入；三、武力兵久不用，致使軍備不堅；四、人才未曾教，致使賢才匱乏；五、財政奢靡，致使國家經費短用；六、百姓困頓貧窮，致使天下人無以感恩。歸納以上諸項，則可總結為採納忠言、憂患意識、軍力武備、教育養材、財用適度與民心歸向等六項問題。

綜觀范仲淹〈上執政書〉之內容，可以說：「建整制度；謀畫人才」為其論述之核心，對照兩年前〈奏上時務書〉為「救斯文之薄」，此時的范仲淹具體的養材規劃方針清楚指明「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所以他在擇定縣令郡長希望能達到「課最可尚，論薦頗多」，確實考課；分別議定獎賞，並能以重視廉潔為尚，杜絕腐敗貪污之習氣，並藉以裁去無用之吏員。究其根本，范仲淹論「慎選舉」、「敦教育」，談的是人才擇取的方法，其以「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特別論及學校「養」材之用，其後，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上時相議制舉書〉亦舉出類似的看法：「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范仲淹，2002: 237），另外，在人才考選方面，范仲淹認為要先考策論，再由詩賦，依此來審度士子的全才，在〈上執政書〉之中，范仲淹不斷喊求「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興學成為他敦教育之道的最主要看法。

三、范仲淹南京講學崇古制依「道」而行，未與科舉脫鉤

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范仲淹作〈南京書院題名記〉（范仲淹，2002: 191-192），記文談到南京書院（應天府書院）的興復經過，並論及書院的師資「章甫如星，縫掖如雲」，其中多以通《易》、《詩》與《春秋》等典籍，范仲淹在此文仍深切表達「崇古斯文」之情，多褒「達禮樂製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的狀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書院題名記〉中並不反對士人以科舉入仕為人生目標，特別表彰學生在科舉上的成就為「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由其可知，此時的應天府書院與官學、科舉未有抵觸，更可看見此時書院在科舉取士有推波助瀾之功。另外，從〈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論「道」之意涵，凸顯了范仲淹在書院講學的人才目標：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范仲淹，2002: 175-177）。

上言崇「道」之義可與〈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提「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相符。綜而言之，書院是培養人才，最後而能「致宋之文，炳焉復三代」，換言之，書院是講學機構，入仕復「斯文」為其教育目標。

四、〈答手詔條陳十事〉諸路州郡興學以取「有才有識者」

依《宋史》（脫脫等，1977: 10271-10273），宋仁宗慶曆三年（1403）二月，由於宋廷對於西夏戰事稍歇，李元昊請和，當時的諫官歐陽修對上薦任范仲淹為相，范仲淹原以「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而推辭，後據范仲淹自己的說法，由於宋仁宗數次之催促（范之柔，2002: 928），⁸其後乃提出〈答手詔條陳十事〉（范仲淹，2002: 523-1538），其內容包含：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長官，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減搖役。

其中，「精貢舉」即為范仲淹對於教育制度的具體舉措，其內容可概括為「興辦學校」與「改革科舉」兩項，其實兩項互為表裡，范仲淹倡言興學，認為「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務在興行」，這跟他認為「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的原因有關，易言之，他的看法是：以策論重於詩賦；務通經旨宜先於諸科墨義，顯然，通經致用成為他取材的主要判斷標準，而興學便成為取材的主要手段，其實，歐陽修在〈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其所持的原因是「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歐陽修，1986: 827-828）。宋仁宗慶曆四年（1404），翰林學士宋祁等九位朝臣，由歐陽修主筆，同上〈詳定貢舉條狀〉，明言以興學核舉材之實，其中談到「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歐陽修，1986: 830）。至此，官學大興已是時勢所趨。

我們以「應天府書院」作為北宋書院傳統觀察的啟始，從范仲淹留意「斯文」，以求政治革新為目標，大抵不脫與科舉入仕的實用目的，今人朱漢民（2016: 5-10）以為，以范仲淹為核心的北宋初期書院發展，並沒有特別區分書院與官學的差別，從史料看來，此時的書院擔負的甚至可以說是官學的角色。其實，前述之「救斯文之薄，謀政治革新」的教育目的與「通天下之志」之「宋學」學術發展史脈絡不謀而合。接下來的討論則論及宋學發展與書院教育之間的關係。

⁸ 宋•范之柔撰，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文正公年譜補遺〉，收於《范仲淹全集》，頁 928。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314，〈列傳第 73·范仲淹范純仁〉，頁 10271-10273。

伍、宋學發展與宋初三先生的書院講學

一、宋學發展與書院之關係

關於宋代學術發展史研究，「宋學」做為核心概念的討論多有學者論及，大抵而言，對於「宋學」的理解有以下諸項：第一，宋學是「聖人體用」之學，道德仁義為體；生民政事為用。⁹第二，有別於「漢學」治經之章句訓詁，「宋學」是宏觀之解經通經。第三，與佛老相對，弘揚儒家之「聖賢之學」。第四，強調是「通天下之志」的「義理之學」（漆俠，2011: 5）。

依上而論，「宋學」概念均和「道德」、「聖人」與「致用」等義相關。宋學之發展其實是與書院講學相關的，宋學的學術傳承多在書院講學而致，因此，從學術史宋學的發展亦能窺出書院發展脈絡，依今人錢穆的看法，宋學推本於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學界一般有「宋初三先生」之稱，此說法或許和《宋元學案》黃震案語有關，黃震提到：

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黃宗義，2018: 73）。

依上，宋初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孫先生（孫復）、徂徠石先生（石介）以師道明正學，並透過聚徒講論，闡述各自的論點。

二、明體達用：胡瑗與吳中講學

（一）胡瑗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

今人錢穆認為，胡瑗之「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¹⁰前者為體，後者為用，至此，才有所謂的「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這亦可從《宋元學案》中劉彝回應宋神宗之辭明顯看到：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按：胡瑗），稱為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黃宗義，2018: 25）。

⁹ 錢穆將「宋學精神」視為「道德仁義聖人體用」，又以為「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接著並依此而言胡瑗、孫復與石介在宋初學術發展的重要性。錢穆的思考脈絡是這樣的：晚明以下的漢學之高下淺深得之於宋學的高下淺深，推宋學之始，可從唐開始講起，其以韓愈「師道自尊」去論宋學之精神，從師道再談到宋初學術的發展（錢穆，1994: 2-3）。

¹⁰ 依《宋元學案》中之說法，胡瑗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黃宗義，2018: 23）。

要言之，若言胡瑗之論，可稱是：「體」與「用」相佐；「學術」與「時務」相契，因此，胡瑗講學可以說是「援體致用」，希「所學」與「所用」能相互接續。

以《宋元學案》為例，全祖望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黃宗羲，2018: 23）。又〈安定學案〉居該書之首，可見「安定」一派在「宋學」發展的地位。《宋史》與《宋元學案》俱稱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脫脫等，1977: 12837），可見吳中應當為胡瑗講學之所，至於此所是否為書院，未有直接的史料證之，但可知胡瑗確有在該所聚徒論學，這是屬於私學性質，而不是官學機構。歐陽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對胡瑗的評述為「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歐陽修，1986: 178），足見胡瑗在當時的學術影響力。

胡瑗與范仲淹的淵源頗深，范仲淹經略陝西時，徵用其為丹州之推官，後來又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宋史》論其教學「科條纖悉備俱」、「以身先之」，後來慶曆年間興太學，取用胡瑗的教學方法（脫脫等，1977: 12837）。

（二）從胡瑗「論語說」知宋學發展及其書院教育目的

此外，《宋元學案》中所記載之胡瑗「論語說」若干段落與宋學推本道德仁義有很高的關連（黃宗羲，2018: 26-27），值得深入討論，其中論及幾項論點：一、「友者輔仁」，二、「唯恐有聞」，三、「天命修己」，四、「君子薦賢」，五、「聖學可至」，六、「正道盡才」，七、「德重乎言」與八、「獎掖善行」，茲錄其文與《論語》相關文獻對比觀之：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嘑，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愚、魯，辟、嘑。）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為孔子。（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冉求有為政之才，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歛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於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鄙為「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鄉童子。）

其一，胡瑗論「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對照《論語》中言及「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第一）（朱熹，2018: 50）、「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第十二）（朱熹，2018: 141），即是論「友」對於自身德行之助益，「以友輔仁」雖說修身目標在「仁」，但於此，「友」之對於「致仁」有其重要性。其二，胡瑗談「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若與《論語》中言「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冶長第五）（朱熹，2018: 79）相觀，是以「子路」所言說明：善行之為唯恐不能即時而行；更害怕知曉之後，無法有所作為，此可視作胡瑗對於善之知與行的重視。其三，「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中論及幾個概念：「天」、「命」、「性」與「我」，凡此諸概念可看出宋代理學思想先期的脈絡，胡瑗談「命」受之於「天」，我做為主體，可決定「性」之涵攝。若要瞭解胡瑗的思考，必得理解「天」、「命」、「性」與「我」之間的關連性，依今人牟宗三對於中國哲學的特質論說，《詩經·周頌·維天之命》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中朱熹解「天命」為「天道」（牟宗三，1998: 29-30），天道通過憂患意識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便作為人的主體（牟宗三，1998: 23），這裡所提到「敬」，可以《論語》中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述而第七）（朱熹，2018: 95）所呈顯之態度而說。牟宗三稱這樣的「天道與人性關係為既「超越」（Transcendent）而「內在」（Immanent）」（牟宗三，1998: 30），若與胡瑗所言之語脈合觀，便可理解其所論述的思考為：作為主體性的我，受「天命」、「天道」下貫，而與其相契，是以確立「性」之內涵，但由於人的個性駁雜，故有「愚、魯，辟、嘑」的情況，不過，胡瑗強調透過主體的修為可以進行修正，也特別論及在「天道」影響下的主體內涵。其四，「君子薦賢」之言即是明君子與小人之別，胡瑗引《論語》「臧文仲竊位」即與《大學》中「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朱熹，2018: 6）之理若合符節。其五，胡瑗闡明「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為孔子」，雖然子貢提到「夫子不可及」，¹¹但孔子是有心向學而後成為孔子，在胡瑗看來，聖是可學而至的。其六，胡瑗引《論語》語，倡言宜行正道、盡人之才，但大貶因才得利而誤入歧途如冉求之徒、管仲僭越國君之禮。¹²其七，胡瑗言「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其實要談的是應以德行為重，勿惑於人之表面言論。此即孔子所談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第十四）（朱熹，2018: 150），前者蓄德其中；後者則善於以言便佞。其八，胡瑗稱頌如《論語》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述而第七）（朱熹，2018: 100），不以人之過往錯誤審視當下行為。綜而言之，在胡瑗看來，

¹¹ 面對陳子禽對於子貢的疑難：「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回應的內容為：「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期行，綏之期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該文主要還是倡言孔子之道「不可及也」，但胡瑗的論法卻不僅於此（朱熹，2018: 194）。

¹² 孔子抨擊冉求聚斂財富，大斥：「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第十一）（朱熹，2018: 128）。另，孔子稱管仲僭禮、器量狹隘，用人奢侈，行國君之禮。原文錄其後：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朱熹，2018: 67）。

達仁修己、求為君子、學聖人之學與行正道為政事，即可說明其「明體達用」之義。而此謂「明體達用」歸本於主體學聖賢事，而後再推之於行正道，這與范仲淹「救斯文之薄」的企求若合符節，學聖賢事乃為求正道、為政事。

三、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孫復與泰山書院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其在科舉應試並不順利，因而退居泰山，研究春秋之學。《宋史》記錄石介稱其非是隱者，稱「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黃宗義，2018: 72），因此范仲淹、¹³富弼薦孫復於朝廷，授官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一）孫復「道」不變性之論學理念

石介言孫復「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黃宗義，2018: 72），此應是孫復在泰山書院講學之況。自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起，石介邀孫復至泰山講學，初立學舍「信道堂」，至康定元年（1040），「泰山書院」設立，石介作〈泰山書院記〉，書院的名稱才定（李國鈞，1998: 71）。孫復曾為文〈信道堂記〉，闡述其對聖賢之「道」的嚮往，在該記中，孫復認為「聖賢之迹」即「道」之所在：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為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復，2004: 169-170）。

依上文，孫復以為聖賢之道無所謂「進、退也、毀、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意謂「道」之不變性，是以，孫復提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以下，關於聖賢道統的發展論，此崇古、尊道、重經的立場，亦可視為後來泰山書院教學的核心理念。

（二）從「窮于身而不窮於道」可見孫復重視「道」之教育目的

另外，在〈泰山書院記〉中，石介更將孫復比擬為孟子、楊子（揚雄）與文中子（王通）等人，提及跟隨孫復從學者眾，¹⁴認為孫復的學術成就「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接著並稱孫復與孟子、楊子與文中子皆是「屯於無位與小官」（石介，2009: 222-224），能潛心著述《易說》、《春秋尊王發微》、《堯權》、《舜制》、《正名解》與《四皓論》，稱其論述可「上宗周、孔，下擬韓、孟」。同時，〈明隱〉中，石介為何要論孫復是「君子居易以待命」？那是為了要駁斥當時人

¹³ 關於范仲淹與孫復最初的交集，魏泰《東軒筆錄》記有：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魏泰，1983: 159）。

¹⁴ 石介提及從孫復學者計有：王沂公、蔡貳卿、李秦州、孔中丞，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石介，2009: 223）。

們認為隱者應當要「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為群」的作為（石介，2009: 95），而在〈與祖擇之書〉，石介也稱孫復「先生之窮，窮于身而不窮於道」，並與「聖人之窮者」孔子相提並論（石介，2009: 178-179）。事實上，孫復的學術論點針對國家取士、為政適用有其看法，例如其以為「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也」，此即抨擊國家取士重文詞、輕經義的作風（蔡方鹿，2011: 104）。這裡所稱之「道」者，其實是孫復對於理想社會秩序的根源性看法。

四、尊《易》重「道」：石介與徂徠書院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脫脫等，1977: 12833）。根據南宋范成大《騷錄》所記¹⁵，「徂徠書院」為當時的天下四書院之一。又《宋史》稱石介「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于家」。後世對於「徂徠書院」之制度、建築與事蹟並無多有記述，若將前述兩則史料合觀，石介丁憂時期的聚眾講《易》應是指在徂徠書院的講學。

今人陳直鏐在《徂徠石先生文集》論及石介所處時代正值慶曆新政前後，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其為國子監直講，同年孫復亦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思振興教育、為政治革新育才，是以太學大興，人數增至數千名（石介，2009: 7-10）。石介對於當時的政事多有感知，於是作〈慶曆聖德頌〉（石介，2009: 7-10），文中稱頌宋仁宗「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大力頌揚一時名臣，如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歐陽脩、余靖、王素與蔡襄等人，但文中提及「大奸之去，如距斯脫」，應是《宋史》中所言的「大姦（奸）蓋斥竦也」，言外之意是指夏竦。孫復見到此文，於是提到石介之禍大概就會從此開始了。

（一）石介尊《易》重「道」與書院講學

〈慶曆聖德頌〉可以看做是石介尊道崇儒與現實政局的綜合，該文在當時透過傳頌，經由時人的傳播，造成對於夏竦等人的厭惡，其後因孔直溫謀反案，因抄家發現其有石介書籍，夏竦遂稱石介當時為詐死，最後竟求開棺驗石介屍（脫脫等，1977: 12836）。足見石介直言政事的個性為其帶來不好的影響。

後世對於徂徠書院的記載不多，不過自石介對於文學、政風的論述可窺出當時他的講學意旨。對石介來說，尊《易》重「道」是他重要的論述，從〈辨易〉與〈尊韓〉可窺其梗概：

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銜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者甚矣！（〈辨易〉）

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為賢。孔子

¹⁵ 范成大稱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范成大，2002: 55）。

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而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數百年復有吏部。（〈尊韓〉）（石介，2009: 79）

從以上的引文，可見石介對於《易》與道統之重視。《易》之用在於救天下之亂；道統論述乃為興復儒家聖人之道（蔡方鹿，2011: 106）。關於道統之論，石介的表述是這樣的：從伏羲氏起，接續論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再談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到韓愈氏，並特指韓愈（吏部）為最。

（二）石介重「道」與闢佛老相關連

其實石介重「道」之論與其闢佛老相關連，關於佛老，石介嘗言：

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怪說下〉）（石介，2009: 63）

這段文字責斥佛老「教壞」對於石介所認為的聖人之「道」序，故必須得反攻佛老造成的影響。若從今人漆俠的觀點接續著談（漆俠，2011: 209），石介談儒佛對立，顯示出當時的社會脈絡：一、這是源於夷夏對立的情況；二、道德禮樂（道統）與妖誕幻惑（佛老）是文化思想的對立；三、尊佛老與祭祀自己的祖先相斥，此即石介稱「怪」之故；四、佛老興盛對於傳統君臣、綱常與道德造成很大的危害。

簡言之，石介在書院教育的發展，由於提出了其所認為的聖人之「道」序，成為其獨特的道統論述，推而究之，石介有其理想性格，其贊慶曆革新、闢佛老之說、欲重新建立聖人道統之說，在在影響了泰山書院與徂徠書院，前者是其師事孫復、與學友論學之所；後者以《易》論學，則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道統論述。

五、宋初三先生思想與書院的關係

依錢穆之論，其主張宋學精神寄於書院，宋學精神包括革新政令與創通經義。范仲淹倡救斯文之薄與興復應天府書院，反映「革新政令」的企圖。又由此可發現宋朝書院教育的脈絡是：從范仲淹開始，興學目的在於「革新政令」；但宋初三先生胡瑗談明體達用、孫復談聖賢之迹唯道所在、石介談尊《易》重「道」；由此可見上述整個發展是由「革新政令」往「創通經義」的方向而行，並且在創通經義的同時，可以發現：北宋初年學術發展是從「外王」往「內聖」的方向前進。最初范仲淹重「革新政令」，甚至其「創通經義」也是為了「革新政令」。因

此，可謂范仲淹的「外王」性格較強；至於，從宋初三先生的發展則有往「內聖」之「道」追求的趨向。

陸、結論

北宋初年，「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在百廢待舉之下，官學教育未能即時因應教育之需求，書院成為補充官學的一種順應方式。然就此時之書院發展，官方的色彩濃烈，朝廷以賜額、賜書、賜田等方式鼓勵書院之興，史料顯示，地方府學與書院的差異性並不大，又北宋建國之初，朝廷崇尚文人之治，對於「懸科取士，為官擇人」至為重視，因此，書院的發展與科舉之間的關連便顯得密切，書院的講學與官學教育並無差異，後至范仲淹慶曆新政起，依范仲淹對於「斯文」之重振，欲藉以革新政局，其所掌之南京書院（應天府書院）亦無反對士人以科舉入仕為目標，遂可見書院與科舉並無扞格，與此同時，慶曆新政亦求諸路州郡興學，地方官學教育遂興起。爾後，宋初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孫先生（孫復）與徂徠石先生（石介）之講學，均與遙接三代之「道」，求「生民建教之本」有關，簡言之，北宋初年以來，自應天府書院為學目的、慶曆新政推行地方官學，乃至宋初三先生之講學，書院的教育目的主要為求理想性的政治格局，以范仲淹之語「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可一言蔽之，可以說，「救斯文之薄」求理想政局，是北宋初年的書院教育目的。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元•馬端臨（1986）。**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
- 元•脫脫等（1977）。**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 宋•王應麟（2002）。**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
- 宋•石介。陳直鏐點校（2009）。**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 宋•朱熹，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2018）。**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 宋•朱熹，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2002）。**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呂祖謙（2006）。**東萊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宋•李燾（1995）。**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 宋•范之柔（2002）。范文正公年譜補遺。收入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頁 911-940）。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宋•范仲淹，李勇先、王蓉貴校點（2002）。**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宋•范成大，孔凡禮點校（2002）。**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
- 宋•孫復（2004）。信道堂記•孫明復先生小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頁 169-170）。四川：線裝書局。
- 宋•樓鑰（2002）。范文正公年譜。收入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頁 862-913）。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宋•歐陽修（1986）。**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
- 宋•魏泰（1983），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
- 清•王夫之，劉韶軍譯注（2017）。**宋論**，北京：中華書局。
- 清•徐松（2016）。**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
- 清•黃宗羲（2018），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2018）。**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

二、近人編輯、論著

- 方笑一（2017）。**經學、科舉與宋代古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朱漢民（2016）。范仲淹的慶曆興學與書院教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2），5-10。
- 牟宗三（1998）。**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李弘祺（1990）。范仲淹與北宋的書院傳統。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編，**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1399-142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 李弘祺（2012）。**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兵（2005）。**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國鈞等（1998）。**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周愚文（1985）。**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 周愚文（1996）。**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
- 周愚文（2012）。宋代科舉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失衡問題因應對策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8（3），105-134。
- 梁庚堯（2003）。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33輯（頁49-124）。臺北：蘭臺出版社。
- 梁庚堯（2015）。**宋代科舉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陳東原（1966）。**中國教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陳雯怡（2004）。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
- 賈志揚（1995）。**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漆俠（2011）。**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北京：人民出版社。
- 劉子健（1986）。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史研究集**第4輯（頁189-207）。臺北：國立編譯館。
- 劉寧（譯）（2015）。Peter K. Bol（包弼德）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蔡方鹿（2011）。**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鄧洪波（2006）。**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錢穆（1994）。**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
- 嚴耕望（2009）。**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1998）。**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Saving the Loss of This Culture of Ours: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he Academ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Chih-Wei Lo¹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Past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the education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Academy i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ideal of morality. The researcher's questioning consciousness is: Is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purely related to moralit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we can see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failed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y education became a way to supplement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The officia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academie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From the Yingtianfu Academy's academic purpose, the Qingli Reforms to promote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and even lectures by three scholars in the early Sung Dynasty, the Academies are aimed at the ideal political situation. Just as Fan Zhongyan's words "the intellectuals worry that the article is shallow" Therefore, "Saving the Loss of This Culture of Ours" is the purpose of the academic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Keywords: Academy, official school system, this culture of ours, educational purpose

¹ Director Of Academic Affairs, Tainan Municipal East District Chongsyue Elementary School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h-Wei Lo, E-mail: blueerik3@yahoo.com.tw
Received: 2019/04/29; Accepted: 2019/12/06